

边塞符号与帝国心象：秦汉文学中的长城意象建构

范记川^{1*}

(¹ 衡水健康科技职业学院 马克思主义教学部, 河北 衡水 053000)

摘要: 长城在秦汉文学的语境中, 并非只是静态的地理实体, 而是随时代书写不断被赋予新内涵的动态文化载体。由秦至汉, 长城实现了从“功罪标记的物理屏障”到“承载帝国心态与个体情感的文学心象”的深层转变。秦代官方话语将其塑为武功纪念碑, 民间叙事却视之为暴政符号, 形成鲜明对立; 汉代文学则以史传奠定历史维度、辞赋注入个人感怀、乐府诗书写征戍伦理, 最终使长城升华为界定“华夷之辨”的文化心理边界, 为中国文学中长城意象的丰富性奠定根基。

关键词: 秦汉文学; 长城意象; 符号建构; 帝国心象; 文化边界

DOI: <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6.v1i3.1378>

The Frontier Symbol and the Imperial Psyche : Constructing the Great Wall Imagery in Qin—Han Literature

Fan Jichuan^{1*}

(¹ Hengshui Health Technology Vocational College, Department of Marxist Studies,
Hengshui, Hebei, 053000, China)

Abstract: Within the literary context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the Great Wall was not merely a static geographical entity but a dynamic cultural carrier, continually endowed with new connotations through contemporary writings. From the Qin to the Han dynasty, the imagery of the Great Wall underwent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from a "physical barrier marking achievements and faults" to a "literary imaginary embodying the imperial mindset and individual emotions." Qin official discourse molded it into a monument to military prowess, while popular narratives viewed it as a symbol of tyranny, creating a stark opposition. Han literature, however, established its historical dimension through historical texts, infused personal sentiment through rhapsodies (fu), and articulated the ethics of garrison life through Music Bureau poetry (yuefu). Ultimately, this process elevated the Great Wall into a cultural—psychological boundary defining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Hua and Yi,"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the rich complexity of the Great Wall imagery in Chinese literature.

Keywords: Qin and Han Literature; Great Wall Imagery; Symbolic Construction; Imperial Imaginary; Cultural Boundary

作者简介: 范记川 (1995-), 男, 河北邢台, 硕士, 研究方向: 中国史

通讯作者: 范记川, 通讯邮箱: fjchxb123@163.com

引言

当“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1]这句咏叹出现在汉代乐府中时，“长城”已脱离战国时期北疆土石工事的原始属性，也超越了秦始皇连接边塞的政治工程意义。它逐渐演变为横亘在帝国疆域与文人精神世界之间的文化地标，既烙印着王朝扩张的荣耀，也沉淀着普通民众的血泪。在中国文学长河中，长城意象的持久性与内涵厚度罕有其匹，而这一意象的核心特质，正是在秦汉——中国首个大一统帝国时期——完成了奠基与塑形，“中国诗歌史上，对某一建筑物的吟咏，没有比对长城的吟咏时间跨度更大、数量更多、反映面更广、情感更为强烈的了”^[2]。

目前学界对唐代文学中的长城意象研究已颇为深入，但针对秦汉文学中长城意象“生成与演变”的系统性研究仍有拓展空间。现有涉及秦汉长城的文学研究，多零散见于史传叙事、乐府诗、边塞诗主题分析等相关成果中，或聚焦《饮马长城窟行》等单一文本的情感解读，或依附于秦汉边疆政策的历史探讨，尚未见系统性地勾勒出长城意象在秦汉时期文学中的动态演变脉络。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梳理秦代出土文献、民间歌谣与汉代史传、辞赋、乐府诗中的长城书写，探讨其意象转化的内在逻辑与文化内涵。

1 秦代：功罪对立的符号初构

秦统一六国后，长城的文学形象在官方话语与民间叙事的张力中确立起点，呈现出“朝堂颂扬”与“民间悲怨”的两极分野。这种对立并非简单的视角差异，而是秦代“以法为教”的统治逻辑与民众生存体验碰撞的文学投射。

在官方叙事中，长城被塑造成帝国武功与统一秩序的宏伟象征。秦始皇巡游天下的刻石文，如《碣石刻石》所载“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秦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3]，是其意识形态的核心宣示。其中，“堕坏城郭”与“夷去险阻”明确指向帝国内部，旨在消除六国割据的物理屏障，体现了巩固统一的政治策略。与之相对，长城的修筑则是针对外部匈奴威胁的外向防御措施，“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4]。在秦帝国的整体战略中，这两者共同构成了“大一统”的双重面向：对内消弭纷争，对外确立边界。长城作为“圣意”与“神功”的象征，与内部整顿措施一同成为“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3]这一终极秩序的物理基石，从而升华为一个崇高且不容置疑的政治符号。

然而，与官方颂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回荡在民间与历史记载中的悲怨叙事。修筑长城所带来的沉重徭役与巨大死伤，使其在非官方话语体系中成为“暴政”的代名词。在《史记·蒙恬列传》中，司马迁在肯定修筑长城功绩的同时予以严厉批判：“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何乃罪地脉哉？”^[5]，此处直指其“轻百姓力”的本质。班固在《汉书·蒯伍江息夫传》中也指出修长城所付出的沉重代价，“遣蒙恬，筑长城，东西数千里，暴兵露师，常数十万，死者不可胜数，僵尸盈野，流血千里。”^[6]而出土文献与民间歌谣进一步印证了这种苦难记忆。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徭律》规定：“御中发徭，乏弗行，赀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谇；六日到旬，赀一盾；过旬，赀一甲”^[7]，严苛的徭役制度为长城修筑的“疲民”提供了制度背景。而秦代民间流传的《长城谣》更是直白控诉：“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8]，以“生男不举”的极端表述，揭示长城修筑对家庭结构与人口繁衍的破坏。尽管后世“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在唐代才形成完整情节，但不可否认的是秦代已存在“民夫筑城死，家人悲泣”的原型记忆。

秦代长城意象所呈现的这种二元对立，实质上是“帝国意志”与“个体生存”之间的冲突在文学中的具体体现。官方话语着重强调其“公共价值”，而民间叙事则聚焦于其“个体伤害”，两者之间缺乏调和的中间地带，导致秦代长城意象展现出显著的“符号化”特征——功能指向明确，

但情感与文化内涵相对单一。这一特点为汉代文学对长城意象的重塑提供了广阔的发挥空间。

2 汉代：意象的拓展与情感的内化

汉承秦制而续修长城，其文学书写也延续了秦代“功罪对立”的张力，但通过史传、辞赋、乐府诗等多元文体的演绎，赋予长城更丰富的历史纵深、个人情感与伦理内涵，推动其从“外在政治符号”向“内在文学心象”的转化。

2.1 史传书写：历史纵深与边疆战略的载体

汉代史家在《史记》《汉书》等著作中，将长城置于“汉匈关系”与“帝国边疆治理”的宏大历史框架内，使其成为承载历史记忆与战略意图的叙事载体。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以长城为地理和叙事的支点，详细记载了汉匈之间的和战互动：如元朔二年（前127），汉武帝遣卫青进攻匈奴，“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5]，阐述了汉朝收复河南地后，修复秦长城并以此为基础构建防御体系的过程；又如马邑之谋失败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5]，如实记录了匈奴以长城沿线为目标的频繁侵扰活动。在这些记载中，长城不再仅是孤立的军事设施，而是帝国边疆政策的“晴雨表”——在和平时期，它是贸易与文化交流的边界；在战争时期，则成为双方争夺的前沿阵地。

班固的《汉书》进一步丰富了长城的历史维度与文化内涵。《汉书·西域传》记载：“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犂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6]。长城的功能从“北疆防御”拓展至“西域治理”，使其成为帝国经营西域的重要支点。

汉代史传对长城意象的贡献，还在于突破了秦代“非功即罪”的单一评判模式，将其纳入“帝国治理得失”的思考框架。在《盐铁论·险固篇》中，大夫与文学就长城的价值展开辩论：大夫认为“蒙公筑长城之固，所以备寇难而折冲万里之外也”，将长城视为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文学则主张“在德不在固”，指出“秦有陇坻、崤塞，而亡于诸侯”，认为单纯依赖军事防御无法维系统治^[9]。这场辩论表明，汉代对长城的认知已超越“功能评判”，上升到“治理理念”的层面，使其政治与文化内涵更趋复杂。

2.2 辞赋创作：个人行旅与历史反思的融合

如果说史传为长城搭建了宏大的历史舞台，那么汉代辞赋则让个人走上了这座舞台，将历史沧桑感与个人命运感融为一体。班彪的《北征赋》是这一过程的典范。赋中，作者因战乱而北行，路途所见引发深沉感慨：“越安定以容与兮，遵长城之漫漫。剧蒙公之疲民兮，为强秦乎筑怨”^[10]。作者虽延续了秦代的批判视角，视长城为秦政“疲民”“筑怨”的表现。但其独特之处在于，将这种历史批判与个人的行旅体验深度融合：“涉长路之绵绵兮，远纡回以挠流……野萧条以莽荡，迥千里而无家”^[10]。在这段描写中，长城不再是遥远的历史符号，而是触发个人情感的媒介——秦代筑城的“怨”与东汉战乱的“悲”相互交织，使长城承载了文人对国家兴亡、人生际遇的深沉思考。

2.3 乐府诗歌：征戍之苦与家庭伦理的聚焦

汉代乐府诗以“感于哀乐，缘事而发”^[6]的创作精神，将长城意象与普通民众的征戍之苦、家庭伦理紧密结合，使其成为最具情感共鸣的文学符号。《饮马长城窟行》是乐府诗中最早在题目中明确提出“长城”曲子名的^[2]。在郭茂倩整理的《乐府诗集》中同名诗作共有16首，其中最早的《饮马长城窟行》为无名氏所作，作者将“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的思妇哀怨，与“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的壮士悲苦紧密交织。这些质朴而深情的诗句，将宏大的国家工程拉回到普通人的生活视野。长城在这里，是具体的劳役地点，更是阻隔亲情、制造无数家庭悲剧的伦

理象征。这种对家庭伦理的聚焦，在汉代乐府诗中并非个例。又如乐府诗《战城南》，以“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归”^[11]的惨烈描写和追问，揭示了战争对家庭与社会秩序的破坏。诗中“朝行出攻，暮不夜归”的征夫，与《饮马长城窟行》中“展转不相见”的思妇，共同构成了长城意象的“伦理维度”——长城不仅是帝国的防御工程，更是无数家庭悲剧的制造者。

东汉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伦理批判：“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11]诗中在化用秦代《长城谣》的“生男慎莫举”的基础上，新增“结发行事君”的夫妻感情描写，将徭役苦难与夫妻伦理更紧密地结合，使长城意象的情感内涵更加厚重。至此，长城被彻底情感化、生活化，充满了血肉与温度，一个立体的、能引发普遍共情的“文学心象”至此完全成熟。

3 心象的凝结：从地理边界到文化心理边界

在以上多重书写的共同作用下，秦汉文学中的长城最终超越了其物理形态，升华为界定华夏文明的文化心理边界，成为一种蕴含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的“帝国心象”。

长城意象的凝结，核心在于其确立了“内华夏”与“外夷狄”的文化空间秩序。自春秋时期开始，由于“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12]的影响，孔子提出“华夷之辨”，目的是防范夷狄对华夏的侵犯，“裔不谋夏，夷不乱华。”^[13]班固指出秦始皇修筑长城目的在于“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6]。长城成为践行“华夷之辨”原则的物质载体——它不仅是地理上的边疆界限，更是文化上的“文明分水岭”，“华夷之间以万里长城为界，既防止军事上的越界入侵，又防止文化上的冲突破坏”^[14]。

司马迁对匈奴文化的描述，进一步强化了长城的“华夷边界”意义：“匈奴……随畜牧而转移……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士力能毋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5]这段记载通过对比匈奴“无城郭、无文书”与华夏“有城郭、有礼乐”的文化差异，凸显出长城作为“华夏文明保护者”的象征意义。在汉代文学中，长城之外是“风沙弥漫、茹毛饮血”的野蛮世界，之内是“礼乐教化、男耕女织”的文明家园，这种认知逐渐成为汉代文人的集体心理共识，“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察，长城无疑是秦朝维护国家军事安全的重要战略设施，同时也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外显标识，是受“华夷之辨”中“严夷夏之防”理论影响的产物”^[14]。

长城意象的凝结，还体现在其成为“帝国安全”与“个体牺牲”伦理冲突的承载者。班彪《北征赋》中“剧蒙公之疲民兮，为强秦乎筑怨”的感慨，正是这种伦理复杂性的文学表达。班彪既认可蒙恬筑长城“却匈奴”的历史功绩，又悲悯“疲民”的个体苦难，这种“既肯定又批判”的双重态度，成为汉代文人对长城的普遍认知。乐府诗《饮马长城窟行》则从普通民众的视角，展现了这种伦理冲突：思妇既希望征夫能在长城戍守中保家卫国，又渴望征夫早日归来团聚，这种矛盾心理使长城意象突破了“非功即罪”的单一评判，呈现出丰富的伦理内涵。

4 结论

纵观秦汉时期的文学书写，长城意象完成了一场深刻的蜕变。它从秦代标志功罪的、相对扁平的政治符号，历经汉代史传的历史化、辞赋的个人化与乐府诗的伦理化，最终演变为一个蕴含了历史纵深、个人感怀、征戍之苦与华夷之辨的复杂帝国心象。这一演变过程，不仅反映了文学自身表现力的不断深化，更折射出秦汉两大帝国在构建统一意识形态、处理边疆民族关系以及应对内部社会矛盾时的复杂心态。

秦汉文学所建构的这套关于长城的意象体系与情感基调，几乎囊括了后世长城书写的所有核

心母题。从魏晋南北朝“陇头诗”的悲凉，到唐代边塞诗“秦时明月汉时关”的苍茫，其精神源头皆可追溯至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秦汉文学塑造的长城意象，不仅是特定时代的文化产物，更是中华民族关于文明边界、家国情怀、个体牺牲的集体记忆载体。

参考文献：

- [1] 陈琳. 饮马长城窟行[M]//陈虎, 许琰, 宋芬芬. 玉台新咏. 北京: 研究出版社, 2024: 32.
- [2] 孙志升, 苏君礼. 中国长城志: 文学艺术[M]. 南京: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 9.
- [3] 曾国藩. 经史百家杂钞: 上[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5: 214.
- [4] 贾谊. 过秦论[M]//吴楚材, 吴调侯, 编选; 裴颖, 注译. 古文观止.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20: 128.
- [5]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6] 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7] 王辉, 王伟. 秦出土文献编年订补[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14.
- [8] 陈桥驿. 水经注校证[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9] 桓宽. 盐铁论[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 [10] 班彪. 北征赋[M]//萧统, 编; 于平, 等, 注释. 昭明文选.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0.
- [11] 郭茂倩. 乐府诗集 上、下[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 [12] 公羊高, 撰. 顾馨, 徐明, 校点. 春秋公羊传[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
- [13] 左丘明, 撰. 蒋冀骋, 标点. 左传[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8.
- [14] 龙潇. “华夷之辨”的理论价值与实践逻辑——基于中国古代文化安全思想的研究[J]. 思想战线, 2022, 48(06): 104-115.